

結構性限制： 安倍內閣安全戰略下的臺日關係

何 思 慎

(輔仁大學特聘教授兼日本暨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楊 雯 婷

(國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安倍首相定調《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修訂，完成防衛法制相關修法，「脫戰後」的日本在「美日同盟」架構下，擴大其在國際政治中的安全角色，但不意味日本在對臺政策上將解構「七二年體制」。囿於日中臺三方互動模式的限制，日方在發展臺日關係之際必觀望日中關係、兩岸關係的發展。本文發現當日中關係處於低點、兩岸關係穩定的情況下，臺日關係最可能有實質的進展。本文首先回顧臺日關係的文獻及介紹本文將採的分析架構；第二部分則將整理出日本近年如何在安全戰略追求新角色；第三部分則論析何種日中關係、兩岸關係最利於發展臺日關係。最後探究「七二年體制」是否有鬆綁的可能。

關鍵詞：安倍外交、臺日關係、日中臺關係、美日同盟

* * *

壹、前言

2012年底，安倍晉三再任首相後，以具體行動向美國表態「日本回來了」(Japan Is Back)，意味民主黨時期的「親中遠美」政策暫時偃旗息鼓，彰顯與民

主黨政府外交思維的差異。其實，「安倍外交」試圖與「小泉外交」接軌，惟差別在於小泉純一郎首相藉美國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的「反恐戰爭」，提升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安全角色，遂行「正常國家」的建構，而安倍首相則呼應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在亞洲所推動的戰略「再平衡」（Rebalance），擴大「美日同盟」，連結韓、澳、印等美國在亞太區域的戰略安全夥伴，並維持日本在美國「再平衡」戰略中的關鍵地位，實現「脫戰後」的建構。

本文將分析安倍首相定調《美日防衛合作指針》（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修訂，完成防衛法制相關修法，對未來日本在國際政治中的安全角色及「美日同盟」之意義，並討論當日本在安全戰略追求新角色的同時，對臺日關係是否帶來了影響。本文試著回答一個問題：縱使安倍內閣的安全戰略偏向聯合美國制衡中國，為何在安倍任內臺日關係卻沒隨著臺美關係互動頻繁而有更多實質進展，反而在 2013 年臺日漁業協定之後有些停滯。本文以國際體系層次中的互動過程因素來解釋。更具體的來說，臺日關係受到日中臺三方互動模式的規則所限制，使得日本在發展對臺關係時，必然受到「日中關係」、「兩岸關係」這兩組關係的限制。而這樣的互動規則很難被打破，除非「七二年體制」有根本的鬆動。

本文架構如下：首先將回顧臺日關係的文獻及介紹本文將採的分析架構；第二部分則將整理出日本近年如何在安全戰略追求新角色；第三部分則探討日中關係、兩岸關係作為結構性限制性因素，如何限制臺日關係的發展。最後探究「七二年體制」是否有鬆綁的可能。

貳、文獻探討

相對於日中關係研究，臺日關係的研究文獻並不多，而且有些偏向歷史研究，例如以通史的角度來研究臺日關係（川島真等 2009；賈超為 2011；Yoshihide 2001），也有針對單一歷史事件者，如對日中和約的研究（細谷千博 1984；袁克勤 2001）。有些文章則分析特定時期的臺日關係，^① 及針對單一議題的研究。^②

註① 陳水扁時期：Bridges and Chan 2008。馬英九時期：Leng and Chang Liao, 2016；淺野和生 2008；2012；竹內孝之 2012；松田康博 2012。蔡英文時期：Kawashima 2016；Dreyer 2016。安倍的對臺政策，丹羽文生 2018。

註② 例如臺日漁業爭議及合作：Chen 2011, 255-273；Yeh et al. 2015, 293-301。

就本論文的分析角度而言，臺日關係研究中，有兩個角度特別值得注意，一個是兩岸關係的脈絡下論及「臺灣問題」，另一個則是從東北亞區域關係來評估臺日關係。

第一，臺灣問題方面，日本文獻中可看出早在 1972 年日中建交當時，臺灣問題成爲日中建交談判時的爭議點（井上正也 2010; 服部龍二 2011）。家近亮子（2003, 7-8）將臺灣問題分爲四個階段，第四階段爲 1972 年日中建交之後。家近認爲在這階段日本政府及政治人物中仍有強硬的臺灣派，不斷重申「二個中國」「一中一臺」，而隨著臺灣民主化、經濟發展之後又形成新型的臺灣問題。中國方面也有一些談及臺日關係相關研究，內容亦聚焦於臺灣問題（馮昭奎、林昶 2007; 鈕漢章 2006; 李建民 2007; 孫雲 2005）。英文文獻亦有類似角度的作品（Blazevic 2010; Wang 2000）。

第二，東北亞區域關係方面，多數研究將重點放在日中臺之間的相互關係。部分研究指出臺灣問題成爲日中兩國的重大安全利益衝突，招致相互不信任感（朱成虎 2011, 363; 高木誠一郎 2011, 239; Soeya 2001），由此可見臺日關係足於影響日中關係，尤其當日本政府促進與臺灣關係時，中國更易對日本產生不信任感。一些英文文獻在提及臺日關係之際，多著重於臺日之間歷史文化連結、經濟安全相賴、共同民主意識形態，並與兩岸關係作比較。^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何憶南（He 2014）以認同理論中的自我及他者理論切入，分析臺灣對日及對中政策，她指出認同政治爲外交政策偏好的內部決定因素。

此外，由於涉及東北亞安全局勢，美國的角色尤其重要，例如：田中明彥（1999）便指出日中、臺日關係常遭美日關係及美中關係互動所限制。Kamphausen 等人（2005）則以相反角度討論臺日關係互動對於美國的啓發。松田康博（2010）則從東亞政治及安全面來考察美中日三角關係中的臺日關係，他認爲在基本構造上在 2000 年代並沒什麼變化。楊永明（2009）的研究則指出臺日關係也因此受到「美中臺」、「美日臺」二組三角關係的限制。也有一些文章將臺日美中四國都列入討論，Atanassova-Cornelis（2013）便討論了臺日兩國試圖在美中之間取得平衡。

從這些研究可以看出，不管是在日本對外政策的考量上、或抑是在東北亞區域關係的脈絡下，臺日關係的發展往往受到日中臺三角關係框架或更複雜的區域體系框架所限制。有鑑於臺日關係的研究向來較偏向政策分析及敘述性，本文一方面採

註③ 參見：Lam 2004; Noble 2005; Sun 2007, 790-810; Wilkins 2012.

用第二種研究方向，論述在日中臺三角關係框架下的臺日關係及美國的角色；另一方面，希望能將臺日關係研究放入國關政治的層次分析理論框架。

參、分析架構

若以層次分析因素來梳理近年的臺日關係，從國內層次來看，臺日兩國同採民主政治制度、國民交流頻繁密切。尤其自民黨提出「價值觀外交」理念，希望與尊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基本價值的國家強化合作，因此臺灣作為民主國家，與日本在民主、自由等價值觀上理念相通。^④因此臺灣亦在日本價值觀外交著眼之處。決策者層次上，安倍政府及蔡英文政府的互信度及互動亦較前朝良好。^⑤為何仍無像「臺日漁業協定」這樣的實質進展？再者，若從國際體系層次的權力分布結構來看，從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慢慢往美中兩極體系演變，而從結盟關係及實質安全合作來看，日本在安全戰略明顯偏向美國，那近年美臺互動較之前更頻繁，為何日本沒有跟進，推動臺日關係更進一步的進展？

國際體系的定義依學派而有所差異，國際體系除了華茲（Kenneth Waltz）等新現實主義者所強調的「結構（structure）」之外，還包括古典現實主義者及建構主義者所強調的「過程（process）」。^⑥奈伊（Joseph Nye; Nye and Welch 2016, 50）指出結構主要是指單位的權力分布，而過程則是指單位之間的互動。單位之間的互動，包括整個國際社會的國際法、國際慣例、規範，亦包括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類型，例如：國家是否遵守規則、國家是否虛張聲勢、慣於騙人。只談結構無法理解世界政治體系在權力分布近似時，有時出現隨時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霍布斯式無政府狀態，有時卻出現基於共同利益而合作的無政府狀態。像奈伊（2016, 84, 92）便指出雖然 19 世紀的歐洲處於多極體系，權力分布結構沒有顯著改變，但由於拿破崙戰爭帶來了人民主權的革命思想，歐洲政治體系的過程卻已產生變化。因此分析體系層次因素時，除了結構之外，亦應該考量單位之間的互動關係。

放在本文的命題中，左右臺日關係發展的體系層次因素，除了中國、日本、美

註④ 2013 年 1 月 31 日交流協會成立 40 周年紀念時，外務大臣岸田文雄曾致上賀辭，表示：「支撐起臺日間深厚友誼與信賴關係的正是民主、自由、和平等共同的基本價值觀（岸田文雄 2013）。」

註⑤ 馬英九總統上任之初，日方曾質疑馬政府可能會執著於釣魚臺主權問題，可能有「親中反日」傾向，而且上任不到一個月便發生了聯合號事件（淺野和生 2008, 231-240）。不過在馬政府在 2008 年 10 月公布了「臺日特別伙伴關係（Taiwan-Japan Special Partnership）」概念，日方理解到馬政府對於臺日關係的基本認識與對日政策與之前沒太大變化。

國、臺灣等主要行為者的權力分布之外，還包括這些行為者的互動過程。權力分布結構上可看出美中兩極體系逐漸形成，而日本由於為美國盟友，安全面已明確偏向美國，臺灣亦相對偏向美國，則理應形成美日臺聯手制衡中國的態勢，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有鑑於此，本文主張應著重在行為者的互動過程所帶來的限制。

在實務上，我們觀察出日、臺、中三方互動模式的規則：日本在對臺關係決策上一直將其放在對中關係的框架下思考，中國又堅持日本必須嚴守「七二年體制」，使得日本在發展對臺關係時，必然受到「日中關係」、「兩岸關係」這兩組關係的限制。所謂「七二年體制」，即 197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中提及的日本對臺立場（見表 1）。日本據此立場，對臺只保留民間交流，官方及防衛交流只能在私底下進行，而且常常受到大陸抗議阻撓，難有根本上的進展。如表 1 所示，1998 年及 2008 年兩份政治文件中又重申日本對於臺灣問題的立場。

本文的論點為：縱使權力分布結構使安倍內閣安全戰略選擇了倒向美國，當日中臺的互動規則，仍嚴守「七二年體制」所帶來的侷限，日中關係及兩岸關係必然成為限制臺日關係發展的條件，能抑制或促進臺日關係的發展。本文將就安倍內閣時期（2012 年底至 2019 年）的臺日關係進行討論。^⑥ 同處於安倍時期，即日本安全戰略、日本決策者、日本國內政治、社會情況變因大致固定，但當日中關係及兩岸關係有所變化時，日本對臺政策及臺日關係產生了什麼變化。

表 1 日中政治文件中對臺立場

| 政治文件名稱 | 提及臺灣部分論述 |
|---|--|
| 197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
| 1998 年 11 月《日中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 | 「日方繼續遵守日本在《日中聯合聲明》中表明的關於臺灣問題的立場，重申中國只有一個。日本將繼續只同臺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 |
| 2008 年 5 月《日中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 | 「日方重申，繼續堅持在《日中聯合聲明》中就臺灣問題表明的立場。」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公開資料。

註⑥ 安倍首相仍在任，不過 2020 年以後有新冠肺炎這個變因存在，增加比較及分析的難度，筆者決定將討論的範圍停在 2019 年底。

肆、日本尋求安全戰略上的新角色

一、日本「脫戰後」的安保法制布局

安倍晉三首相在「積極和平主義」的旗幟下，進行安保政策之轉軌，實現「脫戰後」的政治建構。2014 年 7 月 2 日，安倍內閣依據變更「憲法第九條」的政府統一見解，以解禁「集體自衛權」行使的閣議決定，為擴大自衛隊的任務範圍啓動立法準備工作，於國家安全保障局成立由助理官房長官（國家安全保障局副局長）高見澤將林和兼原信克領導的 30 位成員工作小組^⑦，全面檢討防衛法制，將《防衛省設置法》、《周邊事態法》、《聯合國維和行動（PKO）合作法》、《船舶檢查活動法》、《武力攻擊事態法》、《國民保護法》等 10 部防衛相關法律整合成《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並以普通法性質的《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取代《反恐特別措施法》，並於《自衛隊法》中，對未達到他國武力攻擊階段的「灰色地帶」事態，為保護與自衛隊聯合行動的美國軍艦，增訂追加允許使用武器的規定。此外，亦將擴充《聯合國維和行動（PKO）合作法》，設立承認「馳援護衛」的條文，允許解救遭遇武裝組織襲擊的「文職人員」以及其他國家軍隊，且在維和行動中，日本自衛隊得使用武器，排除任務執行的障礙。

2015 年 3 月 6 日，安倍首相召開內閣會議通過修訂《防衛省設置法》第 12 條提案，決議通過提升自衛隊的軍職人員（制服組）地位，藉以弭平防衛省內文職官員（背広組）^⑧ 相對軍職官員（即武官）的優勢，重新確立軍職人員節制自衛隊的優勢地位，^⑨ 使自衛隊轉型為一般的軍隊（國防軍），此更可自 3 月 20 日，安倍首相在參院預算委員會表示，自衛隊與他國軍隊的共同訓練「在提高「我軍」透明度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管窺自民黨的「建軍」悲願，首相在國會答詢以「我軍」取代「自衛隊」，其意義令人玩味。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對此辯護指出，「自衛隊是否屬於『軍隊』取決於如何定義『軍隊』。自衛隊受憲法制約，與通常意義上的『軍隊』不同，但若將以防衛國家為主要任務的組織稱為『軍隊』的話，自衛隊亦

註⑦ 此工作小組，由職司與相關省廳聯絡協調及研究如何修法應對武力攻擊事態的官僚組成。

註⑧ 即「西裝組」。

註⑨ 修正案中，廢除原來防衛相如要對軍職武官的統合幕僚長或陸海空幕僚長下達命令時，需文官職的官房長及局長之襄助的現行法令。修正為各幕僚長和官房長、局長等，立於對等地位輔佐防衛相。此外，廢除原負責自衛隊內部訓練、通訊等事務的「運用企劃局」，業務交付軍職武官的統合幕僚監部統一負責。

是『軍隊』（自由時報 2015）。」

再者，2015 年 3 月 12 日，安倍內閣除決定修改《周邊事態法》，揚棄行之有年的關於「周邊」的表述，以「重要影響事態」^⑩ 概念取代，將其改名為《重要影響事態法》，意圖打破侷限自衛隊活動範圍的地理概念，^⑪ 將自衛隊與美軍的合作範圍擴及全球，實現美、日兩國政府提出的「全球規模合作」，更另以《戰鬥支援恆久法》將自衛隊為支援國際社會反恐行動的海外派兵以普通法來規範，不再藉《反恐特別措施法》方式處理，且未來日本無需聯合國決議，只要接受國際組織，例如歐盟（The European Union, EU）、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請求」，即可向全球任何地區派遣自衛隊。《時事通信社》引述自民黨內透露的消息指出，修法的背景存在自民黨內的「國防族」議員提防「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在聯合國決議時，行使否決權，阻礙自衛隊海外派遣」（BBC 中文網 2015）。此外，因應新的「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新設「防衛裝備廳」，專責日本防衛裝備的「轉移出口」。^⑫

2015 年 3 月 22 日，安倍首相在防衛大學校（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的畢業典禮上發表訓示，強調將堅決推進「解禁集體自衛權」後的新安保法制完善工作。安倍首相言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擴散與恐怖主義威脅等國際形勢的變化，並稱「從灰色地帶事態到行使集體自衛權，將推進完善可無縫應對的安保法制」。為此，在《武力攻擊事態法》修訂時，將日本受到攻擊的事態分為「武力攻擊事態」^⑬、「武力攻擊預測事態」^⑭及「緊急對處事態」^⑮，並爭取公明黨支持，檢討《船舶檢查活動法》，擴大自衛隊目前僅限朝鮮半島等日本周邊地區發生緊急事態時的船舶檢查活動範圍，並得在未經對方船長同意下，^⑯ 對除軍艦外的船舶所載貨物及目的地進行盤查，並根據需要，命其改變航路等。此項修法將升高自衛隊捲入戰爭的風險，亦

註⑩ 對於日本和平及安全具有重要影響的事態。

註⑪ 雖然日本政府就「周邊事態」稱「不是地理概念」，但亦在國會答辯中稱「沒有假想中東和印度」，因此被認為具有地理上的限制。

註⑫ 日本政府在 2015 年 3 月 6 日於內閣大臣會議決議於防衛省設置法修正案中新設「防衛裝備廳」，專責戰鬥機等防衛裝備品的研究、調配、出口等事務。新設目的為降低研發、武獲的成本及推動防衛裝備出口，至 2015 年 10 月，建置文官及自衛隊官共計約 1800 名員額的編制。

註⑬ 發生對日本的武力攻擊或有明確的迫切危險（日本への武力攻 が発生したか、明白な危 が切迫している）。

註⑭ 預測對日本的武攻擊（日本への武力攻 が予測される）。

註⑮ 發生恐攻時（テロ行為が発生した）。

註⑯ 即由現行法律的「任意檢查」，修正為「強制檢查」。

為自衛隊巡弋南海預作伏筆。

誠然，美國面對攸關其利益的東亞區域中，中國崛起的挑戰及「朝核危機」，美國別無考慮地僅能選擇日本，因美國在亞太地區結交的新朋友澳洲、越南及老朋友菲律賓仍不足以為美國撐起東亞的半邊天，美國遂行在東亞平衡中國漸趨抬頭之影響力的首選僅有日本，將「東北亞的美日同盟」轉型為「世界中的美日同盟」是「再平衡」戰略的重要路徑。而自衛隊亦可望走出東海，航向南海，與美國共同因應南海的變局。對此，日本眾議員石破茂不諱言，日本應將集體自衛權行使擴及東南亞國家。無獨有偶，2015 年 6 月 1 日，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在眾議院特別委員會中亦表示，在鬆綁「集體自衛權行使」後，「專守防衛」概念已經改變。顯然，日本在「脫戰後」的法制建構中，「專守防衛」應不再制約日本的安保政策。^⑰

二、「美日同盟」中日本新角色

日相安倍將安保法制改弦更張意在將自衛隊逐漸轉型為「正常的軍隊」（國防軍），^⑱ 在揚棄制約自衛隊活動之「周邊事態」的地理限制，^⑲ 以「重要影響事態」^⑳ 取代後，對美軍的支援將漸趨擴大，日本自衛隊可在全世界範圍內協同美軍任務，自衛隊與美軍的一體化亦將隨之增強，成為美國在亞洲的「代理戰鬥力」，實現美、日兩國政府提出的「全球規模合作」，新增在太空和網路等領域的軍事合作。此外，美軍尚有建議設立類似美韓聯合司令部之「美日統一司令部」的意見，美國五角大廈官員表示，「在考慮其他事項之前，將先從建立同盟協調機制開始」（風傳媒 2015），未排除今後實現美、日指揮命令系統一體化的可能性。2015 年 3 月 26 日，美國國防部長卡特（Ashton Carter）對到訪的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表示，日本完善安保法制、解禁集體自衛權的行動是一項「歷史性舉措」，而美、日雙方一致同意繼續深化「美日同盟」。

註⑰ 「專守防衛」指受到對方武力攻擊之後才行使防衛力。然而，2015 年 5 月 27 日，安倍首相在眾議院和平安安全法制特別委員會答詢指出，因針對他國的武力攻擊而採取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情況，若符合新「行使武力三條件」（1. 他國向第三國發動的武力攻擊若威脅到日本的存亡；2. 存在從根本上剝奪日本國民權利的明確危險；3. 允許必要最小限度地使用武力）即為「專守防衛」，安倍認為，發生威脅到日本生死存亡之事態時，採取保護日本國民的行動正是「專守防衛」。

註⑱ 詳參：森本敏、石破茂、西修 2013。

註⑲ 雖然日本政府就「周邊事態」稱「不是地理概念」，但亦在國會答辯中稱「沒有假想中東和印度」，因此被認為具有地理上的限制。

註⑳ 對於日本和平及安全具有重要影響的事態。

因此，安倍內閣推進相關防衛法制修訂除因應解禁集體自衛權行使外，更須將其反映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修訂上^①，據以擴大美、日的安全合作。美、日雙方遂於 2015 年 4 月 27 日在美國華府舉行「美日安保磋商會議」（「2+2」會議），^②就重新修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達成共識，過去《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將日本自衛隊在後方支持美軍的地區限制為日本周邊（周邊有事）以及遠離戰場的「後方地區」（非戰鬥地區），再修訂後的「新指針」取消自衛隊支援美軍的地區限制，使日本自衛隊將可在全世界範圍內協同美軍任務。尤有進者，過去日本自衛隊的活動內容只限於供水、供油以及為傷員提供醫療援助等，而「新指針」將規定，當無戰場作戰時，自衛隊可以為美軍提供彈藥，還可為準備起飛的美軍戰機進行飛機加油作業，讓自衛隊直接肩負美軍之後勤任務。美、日的聯絡體制亦得到強化，美軍幹部將常駐位於日本防衛省的地下層的「中央指揮所」。所謂「中央指揮所」，亦即自衛隊的最高司令部，此舉意在促使美、日間的協作無論是在「有事」，亦或是「受災」情況下，皆得以強化。

2015 年 4 月 28 日，歐巴馬總統與安倍首相在於華府舉行「首腦會談」，發表三份「共同聲明」，^③闡述美、日夥伴關係變革的意義，矢言建構對應全球議題的夥伴關係，將「美日同盟」擴及全球，轉型為「世界中的美日同盟」。為此，美、日達成七項原則共識，揭櫫「尊重領土與主權完整」、「和平解決紛爭」、「支持民主主義、人權及法的支配」、「透過開放市場、自由貿易、具透明性的規則與規制，及高標準的勞動及環保基準擴大經濟的繁榮」、「促進在共同領域的航行及飛航自由的國際法及規範」、「增進健全的區域及國際組織」、「支持有志一同的三邊及多邊的合作」，此亦具體落實在《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中。

2019 年 5 月川普訪日，搭美軍直昇機登上日本海上自衛隊預計改裝成可供 F35B 起降的「加賀號」護衛艦，此為美國總統首度登上日本自衛隊戰艦，與日本

註① 《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仍於冷戰時期的 1978 年，在蘇聯準備向日本進攻的情況下所制定，就防止侵略、日本遭到武力攻擊以及周邊地區發生對日本構成重要影響的事態時擬定具體的規定，旨在規範日本「周邊有事」時自衛隊和美軍的任務分工。美、蘇冷戰結束後的 1997 年，受北韓的核武發展及飛彈試射影響，美、日重新修訂《防衛合作指針》。此次《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修訂乃時隔 18 年的再次檢討。

註②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SCC）。

註③ 此「三聲明」為：〈より繁栄し安定した世界のための日米協力に関するファクトシート〉（FACT SHEET: U.S.-Japan Cooperation for a More Prosperous and Stable World）、〈日米共同ビジョン声明〉（U.S.-Japan Joint Vision Statement）及〈核兵器不拡散条約（NPT）に関する日米共同声明〉（U.S and Japan Joint Statement on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首相共同對美、日官兵訓話，不僅見證令和時代的美日同盟較諸往昔更為強固，更為安倍內閣改裝「加賀號」為「多用途運用護衛艦」（準航母）的防衛政策背書（何思慎 2019a）。

在取代「周邊事態」的「重要影響事態」概念下，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官湯瑪斯將軍（Admiral Robert Thomas）表明美國歡迎日本將空巡的範圍擴大到南海地區。湯瑪斯司令官的發言非無的放矢，日本海上自衛隊新換裝的 P-1 反潛巡邏機，航程 8 千公里，為目前 P-3C「獵戶式」（Orion）反潛巡邏機航程的一倍，讓自衛隊具深入南海巡防的能力。曾經擔任美國海軍駐日聯絡官的「日本戰略論壇」（The Japan Forum for Strategic Studies）研究員紐山（Grant Newsham）認為，在安倍首相力求將自衛隊打造成強悍的先發制人勁旅時，此發展十分合乎邏輯。紐山指出，日本派遣 P-1 反潛巡邏機前往南海，將可與菲律賓等南海主權聲索國家強化軍事聯繫，此亦為安倍為要抗衡中國日益強大海軍力量而設定的目標之一（新頭殼 2015a）。此外，路透社（Reuters）更報導，日、菲刻正著手洽簽《部隊到訪協定》（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允許自衛隊軍機和戰艦使用菲國的軍事基地進行加油、補給等，以便於日本自衛隊擴大在南海的活動範圍（新頭殼 2015b）。日本與同為美國盟國的菲律賓建構防務合作關係，將有助於海上自衛隊及航空自衛隊深入南海，形成美軍在南海的側翼，節制中共解放軍在南海的軍力伸展。

其實，日本已將其軍事觸角伸向南海，2015 年 1 月 29 日，菲律賓國防部長加斯明（Voltaire Tuvera Gazmin）與日本防衛省大臣中谷元在東京簽署備忘錄，雙方聲明將在軍事交流、訓練、防衛科技及裝備方面加強合作。3 月 27 日，美國國防部主管亞太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施大偉（David Shear）在華盛頓表示，美國與日本將加強在南海的能力建設及協調。施大偉強調，「美日同盟」乃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石，此不僅在東北亞，亦包括東南亞與南海（多維新聞 2015）。《朝日新聞》社論指出，《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修訂後，「美日同盟」將產生質變，日本自衛隊亦隨之轉型為「世界的自衛隊」。未來「美日同盟」將不再侷限於菲律賓以北的日本周邊地區，使美、日的安全合作擴及全球，其中與日本「海上生命線」（sea-lane）息息相關的南海將為首要，此亦平添日中關係的變數。

三、日本安全合作多層次化

2015 年 6 月 8 日，日本、澳洲及印度的三國副外長級磋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日本外務次官齋木昭隆、澳洲外交貿易部（DFAT）秘書長瓦吉斯（Peter

Varghese) 及印度外交秘書 (Foreign Secretary) 賈伊尚卡爾 (S. Jaishanka) 出席，此為日、澳、印度首次舉行副部長級對話，揭開三國在安全議題上制度性合作的序幕，並維持日本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近年，中國在南海及印度洋地區提升影響力，促動關注中國海洋活動的日本及印度藉外交與防務部門副部長級對話 (2+2) 機制強化安全合作關係。此外，澳洲亦重視與太平洋、印度洋彼岸的日本及印度之關係，催生三國副外長級磋商。

在外交上，安倍內閣重視具共同價值觀的同盟國、友好國展開三方合作，從而構建在亞太地區對抗中國的框架組織，除美日韓、美日澳、美日印等框架之外，亦藉由日、澳、印度間的持續磋商將日本與各國的安全合作關係多層次化。其實，2006年11月30日，時任外相的麻生太郎 (2006) 在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即以〈建構自由與繁榮之弧〉 (「自由と繁栄の弧」をつくる) 為題，發表演說，勾勒日本今後於國際間所扮演的外交角色。在麻生所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中，印度與美、澳、歐盟等日本傳統友邦並列，透露出印度將是今後日本全球戰略布局中的重要外交伙伴。

無獨有偶，安倍首相於 2012 年 12 月在捷克的報業聯盟 (Project Syndicate) 網站上發表一篇標題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的文章，呼籲相關國家共同守護日本、美國夏威夷州、澳洲與印度以直線連接形成的菱形區域，呼應希拉蕊 (Hillary Clinton) 的連結印度洋與太平洋的「印太」 (Indo-Pacific) 概念，以緊密的美日同盟為基軸，深化與澳洲、印度以及東協等國家的合作。安倍內閣的安全戰略不再滿足於傳統的美日同盟，而是希望結合更多亞太地區國家，合力因應中國的海洋發展戰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中美防務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趙小卓表示，日、澳、印度皆認為南海很重要，而且這不是最近兩年才出現的動向，南海是重要的海上運輸通道，對日本來說，與印度、中東地區及非洲的所有貿易皆須經過此海域 (環球網 2016)。日、澳、印度對中國對南海的實際控制表示關切，稱不容南海成為「北京的湖」，而南海即成為三方安全合作的楔子。因此，「美日澳印」戰略合作是在中、印崛起，亞太格局變化背景下所衍生的，東京及新德里皆遇到結構性的挑戰：她們是否願意在亞洲內部正在形成的以中國為核心的秩序中扮演從屬地位？毫無疑問，日本及印度都不願意居於從屬地位。因此，日、印可能確立一種戰略夥伴關係，試圖聯合起來共同牽制中國的崛起。

2016 年 3 月 1 日，日本「笹川和平財團」與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共同組成的「美日安全保

障研究會」，^④發表至《2030 年的美日同盟》報告書（The U.S.-Japan Alliance to 2030: Power and Principle），強調「中國較諸過去更具攻擊性，為區域最大的不安定要素，…日本的安保法制必須不斷更新，為抑制中國以武力改變現狀，須有強固的美日同盟，亦須改變現行的美日同盟，確立調整後的對中新戰略」。因此，安倍首相以「俯瞰地球儀外交」為經，「積極的平和主義」為緯，拉開「遠交近攻」的對外戰略網絡，其間安倍晉三首相及岸田文雄外相出訪頻度為戰後歷屆內閣之冠，在國際政治各場域中，試圖展現「強大的日本已回來了」，並以「美日同盟」為基軸，與中國在東亞區域政治及全球政經秩序的重構中，競爭「話語權」，維持日本在美國「再平衡」戰略中的核心角色。

安倍政府的日本安全戰略，對內鬆綁對防衛力的限制，強化自身防衛體制，對外日本已經選擇配合美國制衡中國，這些改變皆是基於美日的共同安全利益，因兩國皆警戒中國的崛起。由日前防衛大臣的發言即可看出日方對中國的警戒態度。防衛大臣河野太郎於 2020 年 1 月 14 日於華府戰略國際問題研究所演講時直言：冷戰時擔心蘇聯威脅，現在我們必須擔心中國軍事擴張。他明確指出日本不能且不會忽略中國的侵略性行為，「中國在東海及南海的行動為強勢的、具威脅性的行動，意圖顛覆國際秩序」，如果坐視不管，讓中國持續削弱國際規則及規範，負面的影響不會止於印太地區而會延伸至全世界（日本國防衛省 2020a）。不過，安倍內閣同時採取多管齊下的外交思維，改善日中關係以因應美國「新孤立主義」，避免若美國削弱在亞洲長期軍事參與的承諾、或美國在亞洲影響力下降的風險。

伍、臺日關係與日中臺關係

隨著國際體系結構逐漸轉向美中相爭的格局、美日安全關係越來越緊密，在安倍內閣的安全戰略下日本與臺灣有共通的安全利益，亦有安全合作的需求。^⑤然而，從安倍首相 2012 年上任以來至今，臺日關係卻反而有開高走低的傾向。

註④ 研究會共同主席為前日本駐美大使加藤良三、前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以及 CSIS 所長哈姆雷（John Hamre）。

註⑤ Dreyer（2016）便指出地政學讓臺日兩國有安全合作的需求，臺灣害怕中共以武力犯臺，日本則擔心若臺灣被中共統一，則日中兩國邊界則接近與那國島，對日本防衛考量極為不利。不過，礙於中共的反對，臺日兩國的安全合作要制度化很困難，頂多只能在檯面下進行。

表 2 臺日已簽署雙邊協議 / 備忘錄

| | 日期 | 協議或備忘錄名稱 |
|-------|---------------|---|
| 馬政府時期 | 2009年6月1日實施 | 臺日打工度假簽證制度 |
| | 2010年4月30日 | 強化臺日交流合作備忘錄 |
| | 2010年10月31日復飛 | 臺北松山與東京羽田機場間對飛航約 |
| | 2011年9月22日 | 臺日投資協議 |
| | 2011年11月10日 | 臺日航約（開放天空）協議 |
| | 2012年4月11日 | 洗錢防制及打擊資助恐怖活動情報交換合作備忘錄 臺日間專利申請案加速審查合作簽署備忘錄 |
| | 2012年11月29日 | 臺日電子產品檢驗相互承認協議 臺日產業合作搭橋計畫備忘錄 |
| | 2013年4月29日 | 臺日漁業協議 |
| | 2013年11月5日 | 臺日電子商務合作協議 臺日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合作備忘錄 臺日藥物法規合作框架協議 臺日鐵路交流及合作備忘錄 臺日海上航機搜索救難合作協議 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 |
| | 2013年11月28日 | 臺日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 |
| | 2014年11月20日 | 臺日觀光事業發展加強合作備忘錄 臺日核能管制資訊交流備忘錄 臺日專利程序上微生物寄存相互合作瞭解備忘錄 臺日有關入出境管理事務及情資交換暨合作瞭解備忘錄 臺日互免打工度假簽證費用（同年11月27日換函） |
| | 2015年11月26日 | 臺日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 臺日競爭法適用瞭解備忘錄 臺日強化災害防救業務交流合作備忘錄 |
| 蔡政府時期 | 2016年11月30日 | 臺日強化產品安全領域之交流與合作備忘錄 臺日語文教育交流合作備忘錄 |
| | 2017年11月22日 | 臺日關務合作及互助協定 臺日文化交流合作瞭解備忘錄 |
| | 2017年9月21日 | 修正2014年11月20日簽署之臺日核能和平利用之核能與輻射安全管制合作備忘錄 |

| | 日期 | 協議或備忘錄名稱 |
|--|------------------|--|
| | 2018 年 11 月 30 日 | 臺日優質企業相互承認協議 臺日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合作備忘錄 臺日檔卷資訊交換相互合作備忘錄 臺日中小企業支援及促進中小企業合作備忘錄 臺日年輕研究者共同研究事業實施備忘錄 |
| | 2019 年 10 月 30 日 | 臺日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PH）相互合作備忘錄 臺日設計專利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相互合作備忘錄 臺日環境保護交流與合作瞭解備忘錄 臺日間促進進出口有機食品合作備忘錄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臺灣日本關係協會網站（<https://www.mofa.gov.tw/aear/cp.aspx?n=4810D2C08B273D5E>）、Leng and Chang Liao 2016。

如表 2 所示，以近年臺日之間簽署的協定及備忘錄的重要性看來，馬英九政府時期，臺日深化各方面的交流及合作，簽署一系列協議及備忘錄，其中包括斷交後首次簽的備忘錄「強化臺日交流合作備忘錄」以及重要性最高的「臺日漁業協定」與「臺日投資協定」。蔡英文政府時期雖然亦簽署了不少備忘錄及協議，但在最重要的經貿交流及重疊海域解決方面缺乏進一步的進展。蔡政府初期主要的外交成果為：2017 年 1 月，日方將「日本交流協會」改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而我方也將「亞東關係協會」改為「臺灣日本關係協會」。同年 3 月，赤間二郎總務副大臣訪臺，為 1972 年斷交後，首次有次長級的日本現任官員訪臺。然而，隨著 2018 年後日中關係逐漸升溫，臺日關係的發展呈現停滯。

體系層次權力結構看來，安倍內閣的安全戰略維持傾向美國制衡中國；國內層次上，臺日國內皆為民主制度、日本又追求價值觀外交，甚至以政黨交流而言自民黨與民進黨關係亦素來良好；決策者層次上，安倍首相本人對臺灣很有好感（丹羽文生 2018, 151-153），蔡政府更是在上任前訪日時便與自民黨進行交流。為何 2018 年以來臺日關係卻反而呈現發展停滯？左右發展臺日關係的最主要因素為何？此段將分析日中臺三方互動模式，即「七二年體制」這個框架所帶來的限制，此框架使日本在發展臺日關係時，不斷觀望日中關係及兩岸關係。本節由近年臺日關係發展來分析，當日中關係及兩岸關係處於何種情況下，臺日關係較有可能有進一步的進展。

一、日中關係處於低谷時臺日關係易有進展

首先，當日中關係相對處於低谷時，臺日關係較可能有進展。臺日關係無法拋開北京立場的影響而單獨論之，對日本而言，對中關係遠比對臺關係重要。楊永明便指出對日本而言，「日本對臺政策，向來便依附在其對中政策之下（Yang 2005, 94）」。日本政府在考量對臺關係時，常常是放在對中政策的框架中去思考。^⑥

在此決策架構下，日中關係的親疏程度自然會對日本的對臺政策造成影響。當日中關係親密的時候，決策者擔心臺日關係有所進展會傷害日中關係，在對臺關係上投鼠忌器。反而是在日中關係惡化時，日本對臺政策更可能轉向友好積極（Wan 2007, 178），除了是爲了在東北亞拉攏盟國，也是在對中國打臺灣牌（Matsuda 2017），即藉由發展對臺關係讓中國焦急，而進而願意在外交政策上讓步或進行利益交換。

日中關係在 2010 年中國漁船與日本巡邏船釣魚臺相撞事件之後，即開始因釣魚臺問題相峙不下，2012 年日本政府國有化釣魚臺之後，雙方高層交流中止，日中關係可以說是處於建交以來的最低點。2012 年下半年日本政黨輪替，自民黨重新執政，安倍首相上臺後在年底又參拜了靖國神社，日中關係仍無轉機。兩國領導人直到 2014 年 11 月 10 日才因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在北京舉行而會晤。在這期間，臺日之間簽署了兩個重要協議，2011 年 9 月 21 日簽署《臺日投資保障協議》，2013 年 4 月 10 日簽署了《臺日漁業協議》，後者尤其難能可貴，17 年間歷經 17 次正式會議才終於達成共識。

然而，從 2017 年 6 月之後，日本政府高層多次演說或訪談中，表達了對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計畫的興趣。^⑦2018 年 5 月初李克強訪日參與日中韓峰會。5 月 9 日簽署了談判了十年之久的《海空聯絡機制備忘錄》，該機制於 6 月 8 日開

註⑥ 前駐臺代表內田勝久（2006, 80-81）便批評日本的對臺政策決策機制本身就限制了臺日關係的發展。他提到外務省處理對臺政策的單位是亞太局中國課臺灣班，而這單位的直屬管理者是中國課長。對中國課長而言，當對中、對臺關係存在著利益衝突，中共對臺日之間所有案件都反對、干涉，決策者又認知到對日本國益而言中國比臺灣重要，因此外務省內部害怕臺日關係有所進展時會傷害到日中關係，要期待中國課長會想去推進臺日友好，本來就不可能，他的立場甚至比較站在抑制的角度。

註⑦ 例如：6 月 5 日，安倍首相在日本經濟新聞主辦的第 23 屆國際交流會議「亞洲的未來」晚宴時發表的演講中，表示在滿足若干條件的情況下，將準備就「一帶一路」構想進行合作。外相河野太郎 11 月 18 日在神奈川縣平冢市發表演講時也提及中共倡導的「一帶一路」構想，如果中國在國外建設的港灣設施，採取以誰都可使用的開放形式，將對全球經濟非常有利。參見：日本國首相官邸 2017：田嶋慶 2017。

始運行。從官方高層互動亦可看出，日中高層互訪及舉行會議的頻率在 2018 年後急速攀升，反映了日中關係逐漸升溫。日中兩國甚至在防衛交流層面亦有了進展。2015 年 3 月相隔四年進行第 14 次「日中安保對話」，11 月日中國防部長在出席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ADMM-Plus）之際舉行會談。2019 年 4 月日本派遣護衛艦「涼月」號參加解放軍海軍成立 70 周年海上閱艦，10 月解放軍海軍「太原」號應邀前往日本參加國際艦隊閱艦式。2019 年 12 月河野太郎防衛大臣訪中為日本防衛大臣時隔十年後再度訪中（楊雯婷 2020, 21-22）。

如上述，日中關係在低谷時，臺日關係較有可能有進展。2018 年後安倍走向改善對中關係的路線，自然日本在對臺關係上會相對保持距離。

不過，日中關係在 2020 年可能產生變化。由於新冠肺炎最先由武漢傳出案例，但北京的疫調缺乏透明，新冠肺炎在全球擴散後，面對各國質疑，中國更採取「戰狼外交」，要求各國外交單位避談新冠肺炎的起源，對堅持獨立調查新冠肺炎起源的澳洲進行經濟脅迫，並在社群媒體與他國官員相互指責。此外，5 月底大陸全國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形同片面改變《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諾，這讓各國質疑中國的外交誠信，國際社會紛紛表態譴責或制裁北京。日本政府也對《香港國安法》表態，6 月底菅義偉官房長官及茂木敏充外相皆表示遺憾，河野太郎防衛大臣則認為中國此舉不遵守香港回歸時所作的承諾，可視為改變現狀的行為。此外，白宮 5 月 20 日發表《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7 月 23 日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發表對中演說《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美國的對中對抗路線已經相當明確。在此國際反中氛圍下，安倍若要持續改善對中關係要付出的成本及風險將更高。

另一方面，安倍政府的防疫政策遭到諸多批評，支持率亦下降，為避免在對中政策上又失分，此時會更在乎日本社會對中觀感，不便持續推動改善日中關係路線。再者，港版《國安法》引發日本朝野反彈，日本政壇出現重新檢討習近平訪日的聲浪。自民黨外交部小組提案「請求取消」習訪日一事，^{註 28} 另外，日本跨黨派保守系議員組成的「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亦向官房長官菅義偉遞交請願書，要求中止邀請習近平赴日國事訪問。安倍繼任者之爭也可能聚焦在「誰能打出最強勢的對中政策」。因此，日本國內政治因素亦可能導致安倍在對中政策上調整。

其後，若日本在「後安倍時代」的權力競逐下，對中外交趨向強硬，甚至日本

註 28 決議內容最後在幹事長二階俊博為首之「志帥會」議員堅持維護長年努力所構築之中日關係的意見下，修正為對內閣較不具約束力之「作為外交小組不得不請求取消」的表述。

政治人物爲了表現自己並非親中，在國會提案惠臺法案，此時便是我國爭取與日本深化關係的機遇。

二、兩岸關係穩定使臺日關係較易有發展

在兩岸關係保持穩定的情況下，臺日關係較可能有發展。如上述，日本的對臺政策往往放在對中政策的框架下，因此當兩岸關係過度緊張時，日本爲了避免刺激中國，在對臺政策上會更謹慎，以免開罪對臺日關係異常敏感的中國。日本前駐中大使宮本雄二曾指出，臺灣問題對中國而言是屈辱的大污點，「只要臺灣不回歸，這一幕屈辱的歷史，就無法落幕（林錚顛譯、宮本雄二著 2012, 79-80）」，因此中國對於日本與臺灣發展關係特別敏感。尤其，比起美國，日本曾經在甲午戰爭打敗清國使其割讓臺灣，殖民臺灣五十年之久，日本與臺灣在歷史上曾有的連結，讓中國更忌憚臺日之間的接觸。

以中國的對臺政策來觀察，當臺灣與美國及日本的關係有所進展時，中國傾向懲罰臺灣，而非美國及日本。不過，當兩岸關係保持平穩，雙方政府有制度化的交流，甚至能在諸多議題上達成協議時，例如：馬政府期間，兩岸從 2008 年 6 月的第一次江陳會談之後，便維持了定期對話及交流，也簽署了涉及兩岸包機、在金融監督上的合作、解禁中國的資本投資臺灣、《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等諸多協定（竹內孝之 2012, 94-5）。中國爲了保護對己方相對友善、有一定的互信基礎的政權，也較難祭出懲罰手段。相對於此，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後，由於中共與民進黨政府缺乏互信基礎，中國不但單方面停止官方交流，也更不吝於對臺祭出懲罰措施。例如：川普上任之後，臺美關係有所進展，中國便採取一連串的懲罰策略，諸如挖走我國邦交國、軍艦及軍機繞臺等。再者，中國對日外交思考亦有節制蔡政府在外交及安保上試圖「聯日拒中」，而與北京漸行漸遠的戰術思考（何思慎 2018）。

對日本而言，對其國家利益最有利的兩岸關係應是：兩岸保持穩定的對話與交流，但臺北當局在安全領域傾向美日兩國。兩岸若過度接近，最終走向統一，將不利日本在西南面的安全防衛，對其貿易極其重要的海上生命線亦可能會受到拮制。相對而言，當兩岸過度緊張，若擦槍走火有軍事上的衝突，美國又決定介入，日本亦可能依據《美日安保條約》而被捲入。例如：2011 年美日《2 + 2 會談》中，兩國共同戰略目標中列入了「歡迎目前的兩岸關係改善的進展，並敦促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兩岸問題（日本國外務省 2011）」，這表示馬政府推動兩岸之間的交流及

合作，緩和臺海緊張情勢，符合美日同盟當時的戰略利益。此外，在兩岸關係改善，彼此強化經濟合作的同時，日本亦能在經濟上獲益。兩岸更加緊密的經濟關係也可以幫日商創造經濟機會，有利於日商在中國跟韓商的競爭（何思慎 2015, 60, 63）。

有鑑於此，我國在發展兩岸關係時需謹慎，莫讓國際社會認知臺灣已倒向北京，進而讓美日兩國誤判。美日兩國若誤判的話，可能判斷兩岸將走向統一，亦是一種改變現況（張炎憲、陳美蓉 2012, 131）。短期而言可能會對臺喊話提醒臺灣避免過度傾中；²⁹ 長期而言，則可能停止與臺灣在安全層面上的合作，不論是情報交流或軍售，以免情報流入中國。例如：松田康博（2012）便指出兩岸關係改善之後，美國便沒有理由增強臺灣的軍備，亦無需要冒著冒犯中國的代價對臺軍售。如此一來，對於兩岸之間的軍事平衡會更加失衡，對於維持現況的目標也更遙遠。³⁰

總的來說，兩岸關係保持穩定時，中方較不會動輒過度敏感，而日方也能較無顧忌地發展臺日關係。曾派駐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的經濟產業省官員雖對馬前總統在沖之鳥礁海域問題的因應頗有微詞，但卻肯定馬前總統穩定兩岸關係創造臺日關係空間的對外政策。³¹ 川島真（2016）也曾指出「馬政府之下兩岸關係保持安定，臺日之間才有機會簽定投資協定及漁業協定。」另外，岡田充（2016, 164-165）亦認為，馬前總統時期兩岸關係緩和，使美中、臺美、日中及臺日四種雙邊關係能迴避「臺灣壓力」，確保相對的穩定，其中兩岸關係的穩定為創造雙贏的關鍵。

由於日中關係處於低點、兩岸關係又相對穩定，當時馬政府所採的同時改善與中國及與美、日兩國關係的避險（Hedging）政策（Leng and Chang Liao, 2016），似乎讓臺日關係有進展的空間。相對地，在日中關係改善、兩岸關係漸漸陷入對抗的情勢下，即便蔡政府與安倍政府互動良好、臺日安全利益亦有共通之處，日本國內亦有深化對臺關係的呼聲（林彥宏 2019, 45-46），但「七二年體制」所帶來的互動模式的規則侷限了臺日之間的可能進展。

註²⁹ 前國務卿希特蕊曾在受訪時表示：「現在你們（臺灣）得決定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學到處理這段關係的能力，找出『到此為止，不能越界』的底線，例如我們可以在這項協議合作，但是在另一項協議則否。」參見：王文靜、郭奕伶、田習如 2014。

註³⁰ 此外，我國國內主流民意較偏好與中國發展經濟上及功能性的關係，但對於與中共有進一步政治連結仍有疑慮（Leng and Liao 2016, 375-6）。發展對中政策時若過度躁進，可能會導致國內傾中、親中的批評及反彈，進而削弱國內民衆對執政黨的支持。

註³¹ 筆者 2016 年 5 月 18 日於日本經產省訪談。受訪的經濟產業省官員並直言，蔡英文總統若無法穩定兩岸關係，則臺日關係的空間亦將受到壓縮。

陸、「七二年體制」是否有鬆動可能？

為何日中關係及兩岸關係能左右侷限臺日關係的發展，主要還是因為「七二年體制」侷限且建構了日中臺三方的互動模式。除非「七二年體制」有所鬆綁，不然日本在發展對臺關係時，必定會觀望中國立場。

近兩年日本依然立場沒有變動跡象。據《新華社》報導，2018年5月9日，安倍會見大陸總理李克強時曾允諾，日本將依《日中聯合聲明》之意旨，與臺灣僅保持民間往來。^②另外，2019年10月《新華社》報導又指出王岐山與安倍會談時，中方要求日本恪守日中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各項原則，穩妥處理好歷史、臺灣等問題；而安倍亦回應「願妥善處理臺灣等敏感問題」。^③2020年5月22日，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在記者會上被問到「是否有考慮與臺灣強化防衛交流」，他表明臺日關係屬非政府間的實務關係，今後也沒有改變這種關係的打算（日本國防衛省2020b）。

除非回到「七二年體制」的原點，思考1972年日中兩國改變關係的契機為何。主要是冷戰體制下美國先改變了對中政策，日本對美亦步亦趨迅速與北京建交。則在當前的局勢下，美國是否可能改變對兩岸政策？若美國改變日本又是否會跟進？

第一，美國不太可能在兩岸政策上作結構性的變革。

的確近年美國川普政府修改了對中政策，在貿易、科技、安全層面採取對抗態勢。相對於此，川普政府採取相對對臺友善的政策，使目前的臺美關係有許多進展，例如：2016年12月川普上任前與蔡英文總統通話、美國國務院副助卿及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官員頻繁訪臺、^④2019年5月美國在臺協會搬遷與規格升級、2019年7月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時與美國的政、學、商各界公開聚會，並且到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講等（謝賢璟2019, 96）。最重要的莫過於，表3所列出的美國國會通

註② 《新華社》報導請見：新華網2018。然而在日本外務省的公開資料中，僅在李克強的記者會發言紀錄中提及「雙方確認了遵守中日四份基本文件的基本原則，遵守有關歷史、臺灣問題的雙方共通認識」，但在高峰會會議紀錄及安倍首相記者會發言中都沒提及臺灣。參見：日本國外務省2018a; 2018b; 2018c。

註③ 《新華社》報導見：新華網2019。同樣的，日本外務省的會議紀錄亦沒提及臺灣。參見：日本國外務省2019。

註④ 如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卿黃之瀚2018年3月訪臺；2019年10月國務院主管澳紐暨太平洋事務副助卿暨APEC資深官員孫曉雅（Sandra Oudkirk）率團參加「太平洋對話論壇」（Pacific Islands Dialogue）；2019年11月，國防部東亞事務副助理部長柯林克（Heino Klinck）亦密訪臺灣。參見：李冠成、洪子傑、洪銘德（2019, 79）。

過一系列涉及臺灣的法案。此外，川普上任以來美國已批准對臺 5 項重要軍售，包括 2019 年 4 月 15 日通過的 5 億美元、7 月 8 日通過的 22.24 億美元，以及 8 月 20 日通過的 80 億美元等三項軍售案（李冠成、洪子傑、洪銘德 2019, 80）。

表 3 近年美國通過與臺灣相關的法案或決議案

| 日期 | 法案或決議案名稱 | 與臺灣相關的內容 |
|---------------------|--|--|
| 2018 年 3 月 16 日生效 | 《臺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 | 旨在促進臺美間的高層級交流。 |
| 2018 年 8 月 13 日生效 | 《2019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 第 1257 條款指出加強臺灣的軍事準備、第 1258 條款國會對臺灣的相關意見 |
| 2018 年 12 月 31 日生效 | 《2018 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 第 209 條款闡述美國對臺灣的承諾 ^⑤ |
| 2019 年 5 月 1 日參議院通過 | 《重新確認美國對臺灣及對執行臺灣關係法之承諾》（Reaffirming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to Taiwan an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決議案 | 重申臺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為美臺關係基石，呼籲對臺軍售常態化、落實臺灣旅行法。 |
| 2019 年 5 月 7 日眾議院通過 | 《2019 年臺灣保證法》（Taiwan Assurance Act） | 美國政府落實對臺軍售常態化及支持臺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等國際組織。 ^⑥ |
| 2020 年 3 月 26 日生效 | 《2019 年臺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of 2019），又簡稱《臺北法案》（TAIPEI Act）。 | 旨在透過美國對與臺灣擁有外交關係的世界各國採取實質行動，予以支持確立臺灣在國際之地位。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美國國會網站（<https://www.congress.gov/>）及公開資訊。

註^⑤ 美國政策支持與臺灣間政治、經濟及安全的緊密關係；依《臺灣關係法》、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及「六項保證」忠實實現美國對臺灣的承諾；反對改變臺海現狀，支持兩岸都能接受的和平解決方案；亦要求美國總統應定期對臺軍售，並依《臺灣旅行法》派遣高階官員訪問臺灣（U.S. Congress 2018）。

註^⑥ 法案中亦直言臺灣為美國自由及開放印太戰略的重要部分（U.S. Congress 2019）。

姑且不論美國修改對中、對臺政策究竟是川普政府爲了迫使中國接受貿易協議條件，而採用的極限施壓政策，還是真的有心修改陳舊的兩岸政策。然而除非美國正式打破其「一中政策」，在外交關係上正式承認中華民國，不然目前此程度的對中、對臺政策更動仍難以撼動日中兩國之間的「七二年體制」。更何況，美國政府在增進臺美關係之餘，仍然不忘重申美國的「一中政策」不變。³⁷ 由此可見，美國要打破「一中政策」的可能性不高。

究竟美國對臺戰略必然要考量到：須避免與中國正面軍事衝突、其他盟國擔心被捲入戰爭、美國企業的商業及經濟利益、美中關係在其他議題上的合作關係，甚至中國武力犯臺灣的可能性。美國若在中國向來視爲核心利益的臺灣問題上作結構性的改變，對美國而言不太務實。因此美國頂多只能像現在這樣打擦邊球，透過在國會所通過的法案，或外交、國防官員表態支持臺灣，來深化臺美關係。此舉亦是在中國試圖限縮臺灣外交空間的同時，幫臺灣爭回一些外交空間。換句話說，美國仍然致力於維持兩岸之間的現狀。

第二，即使美國打破其「一中政策」，日本也未必會亦步亦趨。

當前的國際體系已非冷戰的兩極體系，國家不再只能在美蘇之間選邊站、在外交政策上受到大國制約。依現在全球化互賴的程度，多數國家不是依賴中國市場就是對中國有偌大投資。況且，美中兩國正在面臨權力轉移階段，美國是否會延續其霸權或中國會取而代之，情勢仍然不明。在此階段一般國家不太可能開罪正在崛起的中國，徑自改變對臺政策。

即使是一向對美依從的日本，面對難以預測的川普政府，日本在對俄、對中、對伊朗政策上都試著走出自己的自立外交路線。³⁸ 在經濟面尤爲明顯，中國的經濟地位讓日本無法無視，安倍僅能週旋於中、美之間。尤其，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及消極應對《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川普令安倍的外交陷入尷尬。川普主政後，美國從多邊主義的後退，使 RCEP 談判中的美國因素

註³⁷ 舉例來說，2019年8月，龐培歐與王毅在泰國會面，王毅敦促美方恪守一中原則，隨後美國國務院重申美方政策沒有改變，美國仍信守美國的「一中政策」與美中三公報，以及臺灣關係法下的義務。同年9月，美國政府邀請我國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徐儷文參與於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全球呼籲保護宗教自由」活動，當被記者問及徐儷文以何種身分參與活動，美國國務院官員在9月25日表示臺灣是宗教自由的典範，亞太區域宗教自由的領導者，也重申美國的「一中政策」不變。

註³⁸ 前外務省官員孫崎亨（2012, vii）曾直言「日本有自身獨特的價值。這並不一定與美國所追求的價值相一致。面對強大的美國，如何最大限度的實現自身價值，這才是外交」。

弱化。在對中外交上，安倍亦不必與川普對華戰略亦步亦趨，得以採取對中接近政策，避免捉摸不定的川普在中、美貿易戰中階段性休兵，使日本繼 1972 年後再因美國在對中政策出爾反爾而陷入窘境（何思慎 2019b）。因此即便美國若在兩岸政策上有重大變革，要重視經濟面的日本在北京未同意的情況下，獨自鬆綁「七二年體制」恐怕機會不大。

柒、結論

安倍內閣促成了日本安保法制轉軌，解禁「集體自衛權」行使、強化美日同盟、多邊安全合作，為制衡中國作出了準備。的確面對中國的崛起，臺日有共通的安全顧慮。臺灣扼住日本南疆，臺海局勢攸關日本的周邊安全。然而，這不意味日本在對臺政策上將改弦更張，揚棄「七二年體制」，超越美中關係框架，建構臺、日間具主權意涵的關係。由於日中臺三方的互動模式仍然被侷限於「七二年體制」，因此日中關係及兩岸關係仍然左右著臺日關係的發展。由臺日關係此例可看出僅論權力分布結構的盲點，因為國家間關係時常依循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互動規則，未必會隨著新現實主義所認知的國家政策偏好而行動。

本文固然強調體系層次的互動模式所形成的限制性因素，然而國家層面、決策者層面並非不重要。如上述，日中關係、兩岸關係的變化時常由國內政治層面、決策者層面因素所主導。馬政府及蔡政府的大陸政策相左，即形成不同的兩岸互動形勢，牽動臺日關係，而日本國內輿論對中觀感若惡化、自民黨黨內反中聲量隨之增強的話，則易使安倍的對中關係改善路線受挫，日中關係可能停滯或降溫。

確實以權力分布結構來看，臺灣作為國際政治中較小的行為者，在外交上易受制於大國的角色。因此，臺灣在外交決策之際，須著眼美中博奕及印太周邊國家之外交應對，因勢利導，謀求極大化臺灣之機會與利益。然而，我國亦應謹防美日兩國打臺灣牌，口惠而實不至。³⁹ 美日可能藉由給予臺灣一些象徵性的好處，但其意圖並非修改對臺政策，而是施壓北京，使中國在其他議題上對美日作出讓步。即「臺灣問題」重回日中關係中的議題，甚至成為中國與美、日之間外交籌碼。因此如何在發展美日關係之際，與中國維持穩定的關係，不使臺灣成為美、日、中博弈

註³⁹ 《共同社》資深主筆岡田充提醒臺灣，在「美日同盟」與中國的對峙下，臺灣莫成為「安倍外交」因應日中關係的「臺灣牌」。筆者 2016 年 3 月 18 日於臺北訪談岡田充。

中的棋子，為臺日關係發展的重點。再者，臺灣在尋求發展臺日關係之際，仍然應該堅守臺灣自身的利益，如 Dreyer (2016, 600-606) 指出，臺日之間仍在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漁業權、慰安婦、福島核災區及鄰近四縣農產食品進口限制、釣魚臺爭端等。因此，在發展臺日關係之際亦須堅守原則，權衡得失。

* * *

(收件：109 年 3 月 3 日，接受：109 年 7 月 7 日)

Structural Restriction: Abe Administration's Security Strategy and Taiwan-Japan Relations

Szu-Shen Ho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Japanese Department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Japan & East Asian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Florence Wen-Ting Ya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Abstract

Prime Minister Abe has finished amending *The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as well as completed the legislation of defense laws. The “de-postwar” Japan,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U.S.-Japan alliance,” will play greater security rol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Japan will de-construct the “1972 system,” a foundation in which Japan, China, and Taiwan all construct and restrain their interaction rules and patterns. Therefore,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still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Japan relations. This paper finds that when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mire in tension and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remain stable, Taiwan and Japan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irst provide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aiwan-Japan relations and introduce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n it investigates how Japan pursue its new role through revising its security strategy. Emphasizing the restrictions in Taiwan-Japan-China interaction pattern,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how the changes

in Sino-Japanese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Abe administration facilitate or refra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Japan relations. The last part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de-constructing the “1972 system.”

Keywords: Diplomacy of Abe, Taiwan-Japan relations, Taiwan-China-Japan Relations, U.S.-Japan Alliance

參考文獻

- BBC中文網，2015，〈日本執政黨擬議法擴大外派自衛隊範圍〉，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2/150220_japan_defence，查閱時間：2020/02/15。BBC News. 2015. “Riben zhizhengdang ni yifa kuoda waipai ziweidui fanwei” [The Ruling Party of Japan Proposed Law to Expands the Scope of Geographic Region to Send the Self-Defense Forces Troops]. (Accessed on Feb. 15, 2020).
- 王文靜、郭奕伶、田習如，2014，〈獨家專訪呼聲最高的下一位美國總統希拉蕊：越依賴中國，臺灣越脆弱〉，https://magazine.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_page.aspx?id=22631，查閱時間：2020/02/14。Wang, Wen-ching, I-ling Kuo, and Hsi-ju Tien. 2014. “Dujia zhuanfang husheng zuigao de xia yiwei meiguo zongtong xilarui: yue yilai zhongguo, taiwan yue cuiruo” [The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the Most Likely to Be Elected American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illary: The More Dependent on China, the More Vulnerable Taiwan Is].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多維新聞，2015，〈日本罕提天安門事件，美日強化南海抗華〉，<http://global.dwnews.com/big5/news/2015-03-27/59643974.html>，查閱時間：2020/02/14。DuoWei News. 2015. “Riben hanti tiananmen shijian, meiri qianghua nanhai kanghua” [Japan mentioned Tiananmen Incident, Japan and the U.S. Strengthen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自由時報，2015，〈自衛隊是軍隊嗎？〉，<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867266>，查閱時間：2020/02/14。Liberty Times. “Ziweidui shi jundui ma?” [Is the Self-Defense Force an Army?].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何思慎，2015，〈當前日本的中國政策〉，黃自進編，《日本政府的兩岸政策》：49-90，臺北：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Ho, Szu-shen. 2015. “Dangqian riben de zhongguo zhengce” [Japans Contemporary China Policy]. In Huang Tzu-chin, ed., “*Riben zhengfu de liangan zhengce*” [Japanese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Taiwan], pp.49-90. Taipei: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 何思慎，2018，〈中、日友好，臺、日堪虞〉，http://www.taipeiforum.org.tw/view_pdf/486.pdf，查閱時間：2020/02/15。Ho, Szu-shen. 2018. “Zhong, ri youhao, tai, ri kanyu” [China-Japan Relations Improved, Taiwan-Japan Relations Get Precarious].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何思慎，2019a，〈「安倍外交」凸顯蔡政府「對美一邊倒」困境〉，http://www.taipeiforum.org.tw/view_pdf/537.pdf，查閱時間：2020/2/15。Ho, Szu-shen. 2019a.

- “‘Anbei waijiao’ tuxian cai zhengfu ‘duimei yibiandao’ kunjing” [“Abe Diplomacy” Highlights the Dilemma of the Tsai Government’s Policy, “Tilt to the U.S.”].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何思慎，2019b，〈走出歷史困境的中日關係〉，http://www.taifeiforum.org.tw/view_pdf/566.pdf，查閱時間：2020/02/15。Ho, Szu-shen. 2019b. “Zouchu lishi kunjing de zhongri guanxi” [Sino-Japanese Relations Break out from Historical Predicament].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李冠成、洪子傑、洪銘德，2019，〈臺海兩岸之安全情勢發展〉，李哲全、王尊彥編，《2019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79-90，臺北：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
- Li, Kuan-cheng, Tzu-chieh Hung, and Ming-te Hung. 2019. “Taihai liangan zhi anquan qingshi fazhan” [Development of Security Situ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Li, Chechuan, and Tsun-yen Wang, eds., *2019 yintai quyu anquan qingshi pinggu baogao* [Ind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Assessment Report 2019], pp. 79-90. Taipei: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Research Institute.
- 李建民，2007，《冷戰後的中日關係史（1989~2006）》，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Li, Jian-min. 2007. *Lengzhan hou de zhongri guanxi shi (1989~2006)*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1989~2006)]. Beijing: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 林彥宏，2019，〈日本之安全情勢發展〉，李哲全、王尊彥編，《2019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39-46，臺北：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Lin, Yen-hung. 2019. “Ribenzhi anquan qingshi fazhan” [Development of Security Situation in Japan]. In Li, Chechuan, and Tsun-yen Wang, eds., *2019 yintai quyu anquan qingshi pinggu baogao* [Ind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Assessment Report 2019], pp. 39-46. Taipei: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Research Institute.
- 林錚顥譯，宮本雄二著，2012，《日本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これから、中国とう付き合うか），臺北：八旗文化。Lin, Cheng-I, trans. Yuji Miyamoto. 2012. *Riben gai ruhe yu zhongguo dajiaodao?* [How to Japan Get Along with China?]. Taipei: Gusa Publishing.
- 風傳媒，2015，〈嚇阻中國、放眼全球，日美敲定新版《防衛合作指針》〉，<http://www.storm.mg/article/47489>，查閱時間：2020/2/14。The Storm Media. 2015. “Xiazu zhongguo, fangyan quanqiu, rimei qiaoding xinban ‘fangwei hezuo zhizhen’” [Deterring China and Expand Its Scope to the World.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inalize the New

- “Guidelines for Defense Cooperation”].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孫雲，2005，《臺灣研究25年的精粹：政治篇》，北京：九州出版社。Sun, Yun. 2005. *Taiwan yanjiu 25nian de jingcui: zhengzhi pian* [Taiwan Studies, the Essence of 25 Years: Politics]. Beijing: Jiuzhou Press.
- 張炎憲、陳美蓉，2012，《羅福全與臺日外交：綠色執政實錄 3》，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Chang, Yen-hsien, and Mei-rong Chen. 2012. *Luofuquan yu tairi waijiao: luse zhizheng shilu 3* [Lo Fu-chen and Taiwan-Japan Diplomacy: A Record of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Administration 3]. Taipei: Wu San-lien Taiwan History Materials Foundation.
- 馮昭奎、林昶，2007，《中日關係報告》，北京：時事出版社。Feng, Zhao-kui, and Chang Lin. 2007. *Zhongri guanxi baogao* [Sino-Japanese Relations Report]. Beijing: Current Affairs Press.
- 新華網，2018，〈李克強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會談時強調努力實現中日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http://www.xinhuanet.com/2018-05/10/c_1122809044.htm，查閱時間：2020/02/15。Xinhua net. 2018. “Likeqiang tong riben shouxiang anbei jinsan juheng huitan shi qiangdiao nuli shixian zhongri guanxi zhangqi jiankang wending fazhan” [Li Keqiang Emphasized Efforts to Achieve Long-Term,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During Talks with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新華網，2019，〈王岐山訪問日本〉，10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0/25/c_1125151895.htm，查閱時間：2020/02/15。Xinhua net. 2019. “Wangqishan fangwen riben” [Wang Qishan Visits Japan].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新頭殼，2015a，〈美第七艦隊司令：歡迎日巡弋範圍擴大到南海〉，<http://newtalk.tw/news/view/2015-01-29/56408>，查閱時間：2020/02/14。Newtalk. 2015a. “Mei diqi jiandu siling: huanying ri xunyi fanwei kuoda dao nanhai” [Commander of the U.S. Seventh Fleet: Welcome Japan's Decision to Expand the Scope of Its Cruis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新頭殼，2015b，〈拉攏日本，菲將讓自衛隊使用其基地前往南海〉，<http://newtalk.tw/news/view/2015-06-05/60931>，查閱時間：2020/02/14。Newtalk. 2015b. “Lalong riben, fei jiang rang ziweidui shiyong qi jidi qianwang nanhai” [Winning Japan, Philippine will Let the Self-Defense Force Use Its Bas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楊雯婷，2020，〈由日本防衛大臣訪中檢視中國對日本的戰略性容忍〉，《國防情勢月報》，152：21-32。Yang, Wen-ting. 2020. “You riben fangwei dachen fangzhong jianshi zhongguo dui riben de zhanluexing rongren” [China’s Strategic Patience Toward Japan: Observations From Taro Kono’s Visit]. *Defense Situation Monthly*, 152: 21-32.
- 賈超爲，2011，《臺日關係的歷史和現狀》，北京：華芸出版社。Jia, Chao-wei. 2011. *Tairi guanxi de lishi he xianzhuang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aiwan-Japan Relations]*. Beijing: Huayun Publishing.
- 環球網，2016，〈日澳印南海對華達成一致，日本欲藉機稱霸東南亞〉，<http://www.81.net/article/2016/0229/89814.html>，查閱時間：2020/02/14。Global Times. 2016. “Riaoyin nanhai duihua dacheng yizhi, riben yu jieji chengba dongnanya” [Japan, Australia, India Reached Agreement on the South China Sea, Japan Wants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Dominate Southeast Asia].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謝賢璟，2019，〈川普政府「一個中國政策」變化因素之分析〉，《國會季刊》，47 (2): 83-111。Hsieh, Hsien-ching. 2019. “Chuanpu zhengfu ‘yige zhongguo zhengce’ bianhua yinsu zhi fenxi” [Analyze the Changing Factors in the “One China Policy”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47 (2): 83-111.
- Atanassova-Cornelis, Elena. 2013. “Shifting Domestic Politics and Security Policy in Japan and Taiwan: The Search for a Balancing Strateg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sia-Pacific Review*, 20 (1): 55-78.
- Blazevic, Jason J.. 2010. “The Taiwan Dilemma: China, Japan, and the Strait Dynamic.”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39 (4): 143-173.
- Bridges, Brian, and Che-Po Chan. 2008. “Looking North: Taiwans Relations with Japan under Chen Shui-Bian.” *Pacific Affairs*, 81 (4): 577-596.
- Chen, Henry. 2011. “Japan-Taiw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una Disputes in the Atlantic Ocean.”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0 (2): 255-273.
- Dreyer, June Teufel. 2016. “Taiwan and Japan in the Tsai Era.” *Orbis*, 60 (4): 592-608.
- He, Yinan. 2014. “Identity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Taiw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Japan, 1895-2012.”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29 (3): 469-500.
- Kamphausen, Roy D., Yoshihide Soeya, Tetsuo Kotani, Philip Yang, Michael McDevitt, and James E. Auer. 2005. *Japan-Taiwan Interac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eattle WA: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 Kawashima, Shin. 2016.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Government in Taiwan and Japan-Taiwan Relations." *Asia-Pacific Review*, 23 (1): 42-64.
- Lam, Peng-er. 2004. "Japan-Taiwan Relations: Between Affinity and Reality."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30 (4): 249-267.
- Leng, Tse-Kang and Nien-chung Chang Liao. 2016. "Hedg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Taiwans Relations with Japan Under the Ma Ying-Jeou Administration." *Pacific Focus*, 31 (3): 357-382.
- Matsuda, Yasuhiro. 2017. "Japan-Taiwan Relations Under Beijing's Watchful Eye."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7/05/06/japan-taiwan-relations-under-beijings-watchful-eye/> (Feb. 15, 2020).
- Noble, Gregory W. 2005. "What Ca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xpect from Jap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5 (1): 1-34.
- Nye, Joseph S., and David A. Welch. 2016. *Understanding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10th Edition). Boston : Pearson.
- Sun, Jin. 2007. "Japan-Taiwan Relations: Unofficial in Name Only." *Asian Survey*, 47 (5): 790-810.
- U.S. Congress. 2018.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https://www.congress.gov/115/plaws/publ409/PLAW-115publ409.pdf> (Feb. 15, 2020).
- U.S. Congress. 2019. "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19 (Engrossed in House (05/07/2019))." <https://www.congress.gov/116/bills/hr2002/BILLS-116hr2002eh.pdf> (Feb. 15, 2020).
- Wan, Ming. 2007. "Japanese Strategic Thinking Toward Taiwan." In Gilbert Rozman, Kazuhiko Togo, and Joseph P. Ferguson, eds., *Japanese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Asia*, pp. 159-182.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Wang, Qingxin Ken. 2000. "Taiwan in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ld War." *Pacific Affairs*, 73 (3): 353-373.
- Wilkins, Thomas S. 2012. "Taiwan-Japan Relations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 *Asia Policy*, 13, 113-132.
- Yang, Philip. 2005. "Japanese-Taiwanese Relations and the Role of China and the U.S." In Roy D. Kamphausen, Yoshihide Soeya, Tetsuo Kotani, Philip Yang, Michael McDevitt, and James E. Auer, eds., *Japan-Taiwan Interac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p. 85-106. Seattle WA: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 Yeh, Yun-Hu, Huan-Sheng Tseng, Dong-Taur Su, Ching-Hsiewn Ou. 2015. "Taiwan and Japan:

- A Complex Fisheries Relationship.” *Marine Policy*, 51, 293-301.
- Yoshihide, Soeya. 2001. “Taiwan in Japans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65: 130-146.
- 井上正也，2010，《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Inoue, Masaya. 2010. *Nitchu kokko seijo-ka no seiji-shi [Political History of Normalization of Japan-China Relations]*. Nagoya: The University of Nagoya Press.
- 岡田充，2016，〈立法院占拠と兩岸關係〉，關西日中關係学会、神戸社会人大学、桜美林大学北東アジア総合研究所編著，《チャイナドリームと日中關係》：147-165，東京：桜美林大学北東アジア総合研究所。Okada, Takashi. 2016. “Rippoin senkyo to ryogishi kankei” [Legislative Yuan Occupatio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Kansai Branch, Japan-China Relations Association, Kobe Social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J. F. Oberlin University, eds., “*Chainadorimu to nitchukankei*” [*China Dream and Japan-China Relations*], pp. 147-165. Tokyo: Northeast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J. F. Oberlin University.
- 家近亮子，2003，《日中關係の基本構造：2つの問題点・9つの決定事項》，京都：晃洋書房。Iechika, Ryoko. 2003. *Nitchukankei no kihon kozo: 2tsu no mondaiten 9tsu no kettei jiko [Basic Structure of Japan-China Relations: Two Issues and Nine Decisions]*. Kyoto: Koyo Shobo.
- 岸田文雄，2013/1，〈交流協会設立40周年を祝して〉，《交流》，862：3。Kishida, Fumio. 2013. “Koryu kyokai setsuritsu 40-shunen o iwai shite” [To Celeb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Association]. *Koryu*, 862: 3.
- 高木誠一郎，2011，〈日中安全保障・防衛交流の評価〉，秋山昌廣、朱鋒編，《日中安全保障・防衛交流の歴史・現状・展望》，東京：亜紀書房。Takagi, Seiichiro. 2011. “Nitchu anzen hosho boei koryu no hyoka” [The Evaluation of Japan-China Security and Defense Exchange]. In Akiyama, Masahiro and Zhu Feng, eds., “*Nitchu anzen hosho boei koryu no rekishi genjo tenbo*” [*History, Current Status, and Outlook for Security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okyo: Aki Shobo.
- 細谷千博，1984，《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への道》，東京：中央公論社。Hosoya, Chihiro. 1984. *Sanfuranshisuko kowa e no michi [Road to Peace Treaty of San Francisco]*. Tokyo: Chuokoronsha.
- 朱成虎，2011，〈戦略的相互信頼の構築に向けて〉，秋山昌廣、朱鋒編，《日中安全保障・防衛交流の歴史・現状・展望》，東京：亜紀書房。Zhu, Cheng-hu. 2011.

- “Senryaku-teki sogo shinrai no kochiku ni mukete” [To Build Strategic Mutual Trust]. In Akiyama, Masahiro and Zhu Feng, eds., “*Nitchu anzen hosho boei koryu no rekishi genjo tenbo*” [*History, Current Status, and Outlook for Security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okyo: Aki Shobo.
- 松田康博，2010，〈日米中関係における臺灣〉，王緝思・ジェラルド・カーティス・国分良成。《日米中トライアングル3カ国協調への道》：105-124，東京：岩波書店。Matsuda, Yasuhiro. 2010. “Nichibeichu kankei ni okeru Taiwan” [Taiwan in Japan-U.S.-China Relations]. In Jisi Wang, Gerald L. Curtis, and Kokubun Ryosei, eds., “*Nichibeichu toraianguru 3-kakoku kyochō e no michi*” [*The Road to Japan-US-China Triangl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pp.105-124. Tokyo: Iwanami Shoten.
- 松田康博，2012/5，〈馬英九政權下の米臺関係〉，小笠原欣幸、佐藤幸人編，《馬英九再選：2012年臺灣総統選挙の結果とその影響》：109-124，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アジア経済研究所。Matsuda, Yasuhiro. 2012. “Baeikyu seiken-ka no beitai kankei”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under the Ma Yingchiu Administration]. In Yoshiyuki Ogasawara, and Yukihito Sato, eds., “*Baeikyu saisen: 2012-nen Taiwan soto senkyo no kekka to sono eikyo*” [*Ma Yingchiu Re-election: Results of the 2012 Taiwan Election and Its Impacts*], pp. 109-124. Chiba: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 森本敏、石破茂、西修，2013，《国防軍とは何か》，東京：幻冬舎ルネッサンス。Morimoto, Satoshi, Shigeru Ishiba, Osamu Nishi. 2013. *Kokubo-gun to wa nanika* [*What Is the Defense Force?*]. Tokyo: Gentosha Renaissance.
- 川島眞、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2009，《日台関係史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Kawashima, Shin, Urara Shimizu, Yasuhiro Matsuda, Philip Yang. 2009. *Tainichi Kankei-shi 1945~2008* [*History of Taiwan-Japan Relations 1945~2008*].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 川島眞，2016，〈臺灣の116選挙の読み方：戦後臺灣と東アジアの将来の岐路に立つ蔡英文・新政権〉，<https://www.nippon.com/ja/column/f00038/>，査閲時間：2020/02/14。Kawashima, Shin. 2016. “Taiwan No 116 senkyo no yomikata: sengo Taiwan to Higashijia no shorai no kiro nit atsu saieibun shin seiken” [How to Interpret the Jan. 16 Elections in Taiwan: Post-War Taiwan and Tsai Ing-wen New Administration, Standing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 Future in East Asia].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孫崎享，2012，《戦後史の正体：1945~2012》，大阪：創元社。Magosaki, Ukeru. 2012.

- Sengo-shi no shotai: 1945~2012* [True Character of Postwar History 1945~2012]. Osaka: Sogensha.
- 丹羽文生，2018，〈安倍外交と臺灣：その政治的系譜〉，《問題と研究》，47 (2)：141-172。Niwa, Fumio. 2018. “Abe gaiko to Taiwan: Sono seijiteki keifu” [Abe Diplomacy and the Taiwan: Its Political Genealogy]. *Issue and Studies*, 47 (2): 141-172.
- 竹内孝之，2012，〈中国との関係改善と臺灣の国際社会への参加〉，小笠原欣幸、佐藤幸人編，《馬英九再選：2012年臺灣總統選挙の結果とその影響》：91-108，千葉：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アジア経済研究所。Takeuchi, Takayuki. 2012. “Chugoku to no kankei kaizen to Taiwan no kokusai shakai e no sankai” [Improvement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Participation of Taiwan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Yoshiyuki Ogasawara, and Yukihito Sato, eds., “*Baeikyu saisen: 2012-nen Taiwan soto senkyo no kekka to sono eikyo*” [Ma Yingchiu Re-election: Results of the 2012 Taiwan Election and Its Impacts], pp. 91-108. Chiba: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 田中明彦，1991。《日中関係1945~199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Tanaka, Akihiko. 1991. *Nitchukankei 1945~1990* [Japan-China Relations 1945~1990].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 田嶋慶彦，2017，〈河野外相「いきなり 教された」中国の批判振り返る〉，《朝日新聞》，<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KCL44RCKCLUTFK004.html>，査閲時間：2020/02/14。Tajima, Nobuhiko. 2017. “Kono gaisho ‘ikinari sekkyo saretai’ Chugoku no hihan furikaeru” [Looking back at China’s Criticism, Foreign Minister Kono: “Suddenly Preached”].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内田勝久，2006，《大丈夫か、日臺関係：「臺灣大使」の本音録》，東京：経新聞社。Uchida, Katsuhisa. 2006. *Daijobuka, Ni-tai kankei: “Taiwan taishi” no honne-roku* [It OK, Japan-Taiwan Relations: The True Record of “Taiwan Ambassador”]. Tokyo: Sankei Shimbun.
- 日本國外務省，2011，〈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共同発表：より深化し、拡大する日米同盟に向けて：50年間の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基盤の上に〉，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pdfs/joint1106_01.pdf，査閲時間：2020/02/14。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1. “Nichibei anzen hosho kyogi iinkai kyodo happyo: Yori shinka shi, kakudai suru nichibeidomei ni mukete: 50-Nenkan no patonashippu no kiban no ue ni”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Toward a Deeper and Broader U.S.-Japan Alliance: Building on 50 Years of Partnership].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日本國外務省，2018a，〈李克強・中国國務院総理の訪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1_000526.html，査閲時間：2020/02/14。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8a. “Ri kokkyo Chugoku kokumuinsori no honichi” [Chinese State Council Prime Minister Li Keqiang Visited Japan].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日本國外務省，2018b，〈日中共同記者発表における李克強総理発言〉，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4_004095.html，査閲時間：2020/02/14。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8b. “Nitchu kyodo kisha happyo ni okeru ri kokkyo sori hatsugen” [Remarks by Prime Minister Lee Keqiang in a Joint Press Releas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日本國外務省，2018c，〈日中共同記者発表における安倍総理発言〉，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4_004094.html，査閲時間：2020/02/14。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8c. “Nitchu kyodo kisha happyo ni okeru Abe sori hatsugen” [Remarks made by Prime Minister Abe in Japan-China Joint Press Release].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日本國外務省，2019，〈王岐山・中国国家副主席による安倍総理大臣表敬〉，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4_005388.html，査閲時間：2020/02/14。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9. “O kizan Chugoku kokka fuku shuseki ni yoru Abe sori daijin hyokei” [Chinese Vice President Wang Qishan met with Prime Minister Abe].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日本國首相官邸，2017，〈第23回国際交流会議「アジアの未来」 餐会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605speech.html，査閲時間：2020/02/14。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 Japan. 2017. “Dai 23-kai kokusai koryu kaigi ‘Ajia no mirai’ bansan-kai Abe naikakusori daijin supichi”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sia’s Future” Dinner, Prime Minister Abe Speech].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日本國防衛省，2020a，〈戦略国際問題研究所（CSIS）における河野防衛大臣講演〉，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mpo/kyougi/2020/0121_j-usa_speech.html，査閲時間：2020/07/30。Ministry of Defense of Japan. 2020a. “Senryaku kokusai mondai kenkyujo (CSIS) ni okeru Kono boei daijin koen” [Speech by Defense Minister Kono at 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Accessed on July 30, 2020).

日本國防衛省，〈防衛大臣記者会見〉，2020b，<https://www.mod.go.jp/j/press/>

- kisha/2020/0522a.html，查閱時間：2020/07/30。Ministry of Defense of Japan. 2020b. “Boei daijin kisha kaiken”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Accessed on July 30, 2020).
- 服部龍二，2011，《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栄、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東京：中央公論新社。Hattori, Ryuji. 2011. *Nitchu kokko seijo-ka: Tanaka Kakuei, Ohira Masayoshi, kanryo-tachi no chosen* [Normaliza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Kakuei Tanaka, Masayoshi Ohira, Challenges of Bureaucrats]. Tokyo: Chuokoron Shinsha.
- 麻生太郎，2006，〈「自由と繁栄の弧」をつくる〉，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easo_1130.html，查閱時間：2020/02/14。Asou, Taro. 2006. “‘Jiyu to hanei no ko’ o tsukuru” [Creating an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Accessed on Feb., 14, 2020).
- 楊永明，2009，〈安全保障の二重の三角関係：一九九五～一九九九年〉，川島眞、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著，《日台関係史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Philip Yang. 2009. “Anzen hosho no niju no sankaku kankei: ichi kyu kyu go - kyu kyu-nen” [Dual Triangular Relation of Security: 1995-99]. In Shin Kawashima, Urara Shimizu, Yasuhiro Matsuda, Philip Yang, eds., “*Tainichi Kankei-shi 1945~2008*” [History of Taiwan-Japan Relations 1945~2008].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 浅野和生，2008，〈馬英九政権の誕生と日臺関係〉，吳春宜、中村勝範、楊合義、浅野和生編著，《馬英九政権の臺灣と東アジア》：201-254，東京：早稲田出版。
- Asano, Kazuo. 2008. “Baeikyu seiken no tanjo to nitai kankei” [The Birth of the Ma Yingchiu Administr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In Wu, Chuni, Nakamura Katsunori, Hei Yang, and Kazuo Asano, eds., “*Baeikyu seiken no Taiwan to Higashiajia*” [Taiwan under the Ma Yingchiu Administration and East Asia], pp. 201-254. Tokyo: Waseda Publishing.
- 浅野和生，2012/12，〈臺日関係と日中関係：「日中国交正常化」を見直す〉，浅野和生編著，《臺日関係と日中関係：「日中国交正常化」を見直す》：1-52，東京：転展社。
- Asano, Kazuo, 2012. “Tai-Ni kankei to nitchukankei: ‘Nitchu kokko seijo-ka’ o minaosu” [Taiwan-Japan Relations and Japan-China Relations: Reviewing “Normaliza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 Asano Kazuo, ed., “*Tai-ni kankei to nitchukankei: ‘Hinaka kokko seijo-ka’ o minaosu*” [Taiwan-Japan Relations and Japan-China Relations: Reviewing “Normaliza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pp. 1-52. Tokyo: Tendensha.
- 袁克勤，2001，《アメリカと日華講和米・日・臺の構図》，東京：柏書房。Yuan, Ke-

qin. 2001. *Amerika to nikka kowa Bei-ni-tai No kozu*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ino-Japanese Peace Treaty: The Com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aiwan*]. Tokyo: Kashiwa Shobo.